

中国文化史丛书

瑰异奇绝的楚文化

——兼谈楚辞

李最欣 王海峰



203

1-9

沈阳出版社

瑰丽奇绝的楚文化

——兼谈楚辞

李最欣 王海峰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上古文明的奇葩	(1)
二、南国有嘉木	(4)
三、路漫漫其修远	(8)
四、熊与一个民族的干系	(21)
五、为楚辞导夫先路的民歌	(28)
六、衣被词人非一代	(39)
七、楚水骚人与文化星座	(43)
八、逸响伟辞与巫风事神	(49)
九、天地扶原与人世沧桑	(55)
十、膜拜众神与巫音袅袅	(65)
十一、嗟嗟烈祖与心存魏阙	(72)
十二、层台累榭与玉盘珍馐	(77)
十三、君子美人与龙凤图腾	(81)

一、上古文明的奇葩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作为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楚文化也是历史悠久的。

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它同东邻的吴越文化和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曾经是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区域文化之花。从楚文化形成的时刻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是中原文化，雄浑如同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是楚文化，清奇如同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遥相辉映。

当楚文化刚刚开始露出迹象的时候，她还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特色不很突出，水平也不是很高。到了春秋中期，楚文化开始走上了它的际会风云时期。从此，她便标新立异，与中原文化竞趋争先，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人们根据现有的资料，认为楚文化一般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xiū）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

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使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仑美奂的高堂邃宇，正是凭借着这六根支柱营造成功的。可以说，楚文化交融、衍生、勃兴、转化的引人入胜的过程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探讨。

同时，作为楚文化的要素之一，楚辞文化的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楚辞文化的源流、背景等有关问题，人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讨。还有学者论述了楚辞文化是具有本土基础的多元文化，并且把它的脉络概括为“西源东流”、“南下北承”，指出它起源于西北，以熊为图腾（图腾是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做本氏族的标志），以𦍋（mǐ，羊鸣声）为族性，并且研究了楚国的巫风巫官及巫书的内容和演变，论证了《橘枳》（táo wù）、《易经》、《山海经》、《楚帛书》等巫书性图籍的特质、内涵及名称由来。总之，与楚文化研究工作的迅猛发展相适应，楚辞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提到楚辞，人们立刻会想到它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是的，我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周代民歌作为动荡不休的战国时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真实的感情以及与统治阶级不懈斗争的顽强精神。这种反映以其真实性、生动性和丰富性而取得的巨大成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滥觞。与《诗经》同时代产生的楚辞尤其是其中的屈原辞赋，因为其从外貌到内质、从语言到精神都鲜明地烙上了楚文化的印记，散发出浓重而纯粹的楚文化气息而得到当时

人和后人的普遍关注。它以其特有的参差句式、音韵铿锵的节奏，特别是大量使用了极度的夸张、丰富的想象，优美的神话传说和富丽的辞藻而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楚辞众多瑰丽奇伟的作品和这些作品形成的奔放自由的风格使它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楚辞是我国长江流域人民的伟大创造，其中的许多神话故事和历史掌故至今仍流传不歇，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它的创作方法不仅已经滋养和哺育了无数的文学作品（历代浪漫主义文学名作就是它的嫡传），而且在今天和以后的文学创作中都有借鉴意义。一句话，楚辞作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是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既然楚辞这么重要，这么有魅力，那么什么是楚辞以及它到底反映了楚文化哪些内容，就是这本书所要介绍的内容。

二、南国有嘉木

楚辞产生于楚地。楚地在哪里呢？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它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最强大的时候控制的所有地区，指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在成熟阶段统治的所有地区，也就是指包括江汉流域在内的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具体说来，是以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后来扩展到今天的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一共是八个省份。南方的楚地，因为它自然地理条件比较优越，很早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当北方黄河流域有炎、黄两大氏族部落进行中原文明的创造时，南方江汉流域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氏族部落。它就是九黎，九黎在楚地辛苦劳作，创造着江汉流域的文明；当北方黄河流域出现了仰韶、龙山文化时，南方江汉流域也现出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仰韶、龙山文化闪耀着华夏文化的光辉，大溪、屈家岭文化闪耀着楚文化的光辉。至少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以前，南北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和基本相似的进程。但是，到了后来，南北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平衡状况：北方中原文

化持续不断地迅速发展，而南方楚地文化则落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南方形成的强大部落都在与北方强大部落的冲突和战争中被击败而分化、衰落了，如九黎被黄帝击败而分化，随后兴起的三苗又长期遭到尧、舜、禹的征伐而衰落，这就使得楚地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二是南方地区多山林水泽，不容易开发，生产力提高就比较慢，各个氏族部落不能象居住在北方平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渔猎的劳动转入农业、畜牧业的生产，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大大限制了文化发展的速度。因此，当北方中原地区已经跃入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时，南方楚蛮地区仍然长久地停留在原始的父亲氏族社会阶段，并始终成为中原王朝压迫、讨伐的对象。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直线型的，而是复杂多变的。南方许多散居的氏族部落，一千余年以来在外抗强敌、内求兴盛的艰苦奋斗中，终于融合成一个强大的楚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楚国家，并且在吸取、学习北方先进的华夏文化和博采、消化南方土著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楚国又可以称为“荆”。春秋战国时代，以湖北为中心延展到其他省份的那个国家为什么要叫做“楚国”，又可以称作“荆”呢？原来，“楚”是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生长茂盛的一种灌木的名字。《诗经·周南·汉广》中有一句“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说的就是这种灌木。《说文解字》云：“楚，丛木，一名荆也。”正是由于南方江汉流域荆楚丛生，人民的生活离不开荆楚，所以商周以来，北方华夏楚就以“荆楚”通称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民族，就象《诗经·商颂·殷武》里所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译：只有你这个荆楚，居住在

中国的南方)、“挾彼殷武，奮伐荆楚”，(译：武丁神速真勇武，奋起威力伐荆楚)。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成为融合南方各个民族的核心力量的一支氏族部落，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山林水泽哺育出来的土著部落，而是生活在北方中原地区的祝融部落的一支。祝融部落后来分化成为八支。其中芈(mi)姓的一支为了寻求安全、富庶的生存环境，南下迁徙到江汉流域，并且在这里扎根、繁衍，成为楚民族的前身。芈楚本身的文化，是北方中原系统的文化，由于它把北方先进文化带入了南方，它所活动的江汉流域便逐渐成为南方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芈楚为着本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江汉流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过程中，在与北方中原王朝和南方土著氏族的交往、冲突中，始终努力吸取北方先进文化，并坚持以其作为本民族的主导文化；同时，它不断地融合南蛮各个民族(例如九黎，三苗的后裔)，不断地消化南方的土著文化。到了商朝初年，芈楚已经发展成为使中原王朝不敢等闲视之的荆楚大族。商朝为掠夺、征服荆楚，不得不派遣大军攻占，后来又长期在楚地设立坚固的政治、军事据点，来防范和扼制荆楚。荆楚在商朝强大的军事势力面前，表面上臣服于商朝，实际上暗暗地积蓄力量，与商朝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可以说，南方的荆楚与北方的中原的斗争是贯穿商朝始终的。商朝时，南北关系一直紧张。不过，商王朝的南侵直接将商文化不断地传入南方，客观上为荆楚学习和吸取北方先进文化以加快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商代，荆楚一直是以商文化为它的主导文化的。而成熟的楚文化也反映出受到了商文化的巨大影响。商朝末期，周王族兴起，荆楚为了摆脱商朝的压迫，就转而

顺从周文王，因为忠实殷勤，周朝初年，荆楚还得到了周王朝的册封。从此，荆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开始了独特的楚文化建设。据《左传》和《史记》记载，楚国刚开始建国时，国家十分弱小，土地还不到方圆一百里，所以一直到春秋中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是以借鉴北方先进文化为主导。考古学家发现的楚地在这段时间里的文化资料，都说明了这一点。从春秋开始，楚国就迅速强盛起来。春秋初期，楚武王北犯中原，自立为王，表现出了他力争平等，傲视天下的大无畏精神，显示了不受任何传统约束的蓬勃生气，以豪迈的气概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到了春秋中期，楚庄王吞并了周围许多小国，极大地扩充了领土面积。据《韩非子·有度》称是“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庄王还以“问（周）鼎之大小轻重”显示了其想要称霸中原的雄心。可以说，楚庄王翻开了楚国雄据南方、横戈九州三百余年，令中原许多国家自愧弗如，惊叹不已的历史，展示了她那独具特色的，并在逐渐统一江汉流域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过程中日趋成熟的，从而体现着当时世界文明最高成就的楚文化系统。

三、路漫漫其修远

了解了楚文化产生的大致社会背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楚文化，还需要进一步追溯楚文化的源头。

楚文化诞生于江汉地区，成长于江汉地区，但它的主要的源头并不在江汉之间。旧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传说中的三苗。三苗，别称“有苗”或“苗民”，是一个庞杂的族系。三苗的“三”，恰巧象九黎的“九”，是说他们族类纷繁，部落众多。因此，三苗的文化遗存不止有一种。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大溪文化和较晚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更晚的石家河文化，都有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遗存。远古的时候，江汉地区的部落流徙不定。在不同族类之间，此退彼进，是常有的事。反映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上，便是先后两种文化之间未必有内在的传袭关系。屈家岭比大溪文化要晚一些，但不能因此说大溪文化孕育了屈家岭文化，对于后来的楚文化，我们就更加没有理由说它是从石家河文化或屈家岭文化的母腹里脱胎降生的。

楚文化的主要源头，我们还是应该到楚人的先民祝融部

落集团那里去寻找。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一点可以从楚国的祀典中找到确凿的证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因为鬻熊是楚君的先人，楚人又以祝融为始祖，所以楚人认为小小的夔国大逆不道，就举兵攻灭了夔国。由此可以想来，祝融在楚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记载说，高辛的火正是祝融。高辛就是帝喾，又叫帝俊、帝舜。火正是什么呢？火正活着时是火官的头领，死了就是火官之神。在传说中，高辛与祝融之间有君臣关系，这反映了两个分别奉高辛和祝融为始祖的部落集团之间的主从关系。这个主从关系给祝融的后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楚人在所有的古帝中特别推崇高辛。他们把高辛奉为宇宙的主宰。

历史上夏人曾与南方的三苗发生冲突，战争的结果是夏人前进了，三苗战败了，只好向后退。在这场战争中，祝融部落集团站在夏人一边，支援夏人，助了夏人一臂之力。夏人与三苗开战，祝融部落集团站在双方之间，除了认夏人为朋友认三苗为敌人，帮助夏人打败三苗以外，必然会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媒介，对南北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时间约当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的后期，与夏代大致相合，虽然上承屈家岭文化，但含有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因此曾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实为受到夏文化影响的后期三苗文化。

因此，楚文化的主源不是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

夏代后期，殷人由东向西推进。他们灭掉了夏朝、建立

了商朝。祝融部落集团既受到了殷人的文化熏陶，也遭到了殷人的武力打击。他们的社会在缓慢地进步着，但是他们的部落渐渐地瓦解着，离散着。

自从有祝融这个称号以来，这个部落集团就一直受到强大的邻邦的威胁和制约。到了夏代和商代，周围全是强大的邻邦，他们处于四面包围的境遇中，分崩离析已经成了他们不可逃避的命运。祝融这个部落集团在上古民族流徙和民族冲突的旋涡中土崩瓦解了，这一点只要看看祝融八姓在中国星散之势的分布就可以了解了。

在商代的时候，殷人称祝融各个部落为荆。荆是一种丛生的灌木，又叫牡荆。祝融各个部落分布在商朝的南境，所以《诗·商颂·殷武》中写到：“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所谓南乡，本来是指大别山，桐柏山以北和伏牛山以东的中原南部，后来随着殷人的逐步向南开拓而同时向南延展。殷人向南开拓，荆人是首当其中。一直到了周代，殷人的遗民还对他们的先祖向南征战的业绩念念不忘。

汉水以东，住有三苗的遗民。殷人向南推进，越过了大别山、桐柏山，三苗的遗民受到了惊扰。慑于殷人的兵威，当地有些部落不得不迁往汉水以西去了。殷人的天文学水平，高于荆人的天文学水平。因此，在商代，荆人的酋长再也不能充任重黎、羲和那样显赫的角色了。商末周初，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半（mǐ）姓后人。他们已经西迁到丹水与淅水一带，以丹阳为中心，他们的酋长叫鬻（yù）熊。鬻熊很有政治头脑，他带领他的臣民背弃了渐渐衰落的商朝，亲附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周朝。《史记·周本纪》说，周文王在位时，有“鬻（yù）子”来拜见和投靠。这个“鬻子”就是鬻熊。

《史记·楚世家》还记载说，鬻熊“子事文王”，就是以子爵的身份来服侍周文王。这“子”，就是周王朝给予归附的异族酋长的封号，是一种原始的爵位。因为鬻熊被周王朝封为子爵，所以鬻熊又可以称为“鬻子”。

鬻熊死于壮年，他的儿子熊丽继承他的位子，当了酋长。熊丽的孙子熊绎，在周成王的时候，被封在楚蛮之地，这才有了“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

楚国刚刚建立国家的时候，地方偏僻，百姓贫穷，势力很弱小，地位也很卑下，还滞留在原始社会时期。名义上是个国家，实际上仅仅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已，他们的文化比周人的文化要落后得多。熊绎的国都也叫丹阳，但却不是在丹水之阳，而是在雒山和荆山之间，就是今天的蛮河中游接近上游的地方，也就是在今天的南漳县城附近。楚人怀旧之情比较浓厚强烈，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居，所以国都虽然迁走了，但名字还是没有改变。楚文化的滥觞期，从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开始，到东周和西周之交楚国将要兴盛的时候结束，历时将近三个世纪。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楚文化的起点，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周成王把一块蛮荒之地封给熊绎，部分原因是周王朝土地面积太大了，这块蛮荒之地周王朝管不了。他把这块地封给熊绎，既是对熊绎占有这块土地的认可，也有画地为牢的意思，就是告诫熊绎，不能再侵占其他地方。熊绎的臣民就只好在雒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里耕耘、开垦，过着十分朴素的生活。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

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筭路蓝缕，以处草莽。跋山涉水，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筭路蓝缕，以处草莽”，说的是生活清苦和居处荒凉。筭路，是一种车子，非常简陋，与民间的柴车类似。蓝缕，就是敝衣。“筭路蓝缕，以处草莽。”说的是熊绎开国时艰苦奋斗的情况。“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说的是熊绎奔波于丹阳、镐京之间，为周天子效力。

熊绎为周天子尽的职责，主要有下列三项。

其一，是守燎以祭天。楚人崇奉火神，他们的酋长是正统的火师。为祭天而守燎的火师，要通晓巫术，善于做神与人之间的媒介。派楚人的酋长做火师，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二是贡苞茅以缩酒。苞茅，就是灵茅。现在想来，一定是楚地所产的苞茅又多又好，以致于楚君有向周室贡苞茅的义务。《左传·僖公四年》记载管仲代表齐桓公责备楚国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这句话译为现代汉语是：“你们上贡的苞茅没有送来，周王朝祭祀的苞茅供不上了，没有东西缩酒，寡人就为这个来讨伐你们。”管仲这里当然是借题发挥，乱找借口，但却堂堂正正。楚国的使者只好认错：“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这句话译为现代汉语是：“进贡的苞茅没有送上，是我们的过错，我们怎么会不供给呢？”缩酒的“缩”字，本作“茜”。“茜”字，上为茅，下为酒，恰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楚人的酋长在岐阳之会上，又管守燎，又管缩酒。楚君以熊为氏，但在楚器上，作为楚君之氏的“熊”一律写为“畀”。熊、畀二字，读音是相近的，所以可以通假，可以换韵。金文“畀”字，好象人饮酒的样子。那个时候，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

对楚君来说，给周王室贡献苞茅是自己份内的事。

其三，是贡桃弧、棘矢以禳灾。楚人子革说：“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固然也是诉穷，说楚地物产不丰，但以桃弧、棘矢，共御王事，却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桃弧就是以桃木为弓，棘矢就是以棘枝为箭，都是用来驱恶鬼，除邪祟的，诸夏原来就有这个风俗。《左传·昭公四年》记鲁国的申丰说藏冰和出冰。“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后世的桃符、蒲剑、艾虎之类，作用与桃弧，棘矢相似。楚君向周室贡桃弧、棘矢，一则由于桃木和棘枝在楚地多有所产，是所谓方物；二则由于楚君作为祝融的后人不乏神秘色彩，他所进献的桃弧、棘矢大概被认为是特别灵验的。

很明显，熊绎这位国君实为首长兼大巫。

丹阳，名义上是楚国的国都，然而没有城池，只是一个寨子，和后世所称的“棘围”很相似。北边有雒山，就是今天的主山寨；南边有荆山，就是今天的荆山，丹阳这个地方处于西边连叠的山岭和东边开阔的河谷之间。今天的蛮河，古时候称为雒水，从丹阳的中间由西向东流去。雒山这个地方，也许古时候山楂和猕猴桃很多，所以称为雒山。荆山，是因为这个山上长有很多的牡荆而得名。楚人的生活就依靠在雒山和荆山之间拓荒，这种生计是相当艰难的。

那个时候，周围是楚蛮，楚国处于中间。楚国的财力和兵力与楚蛮相比完全处于劣势。幸运的是，楚国历来生活在强大的邻国的夹缝之中，所以他们练就了困境中求生的本领，他们能够应付这样的生存环境。他们小心谨慎地处理着和邻邦的关系，而花大力气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由于楚人的先民长时期以来与华夏的先民交往，吸收了